

# 刊本东传背景下的《文选》手抄本传承

高 薇

**内容提要** 手抄本在日本代表了渊源自中国隋唐时期的知识与文化，也承载着平安时期以来各博士官的家族学问与尊严，甚至作为权贵阶层所独占的文化资源，成为王权的象征。面对基于手抄本的古典传统，日本镰仓幕府所在的关东地区从中国传来的刊本身上寻找到对抗力量，京都贵族对此有所行动。以藤原式家为代表的日本贵族摸索出一套适应崭新文本现实的举措，形成《文选》九条本独特的文本面貌：一是保留“本云”“证本”“家本”等身份标记，注重文本底本的权威性；二是在古钞本的眉栏、栏下、栏间及纸背记载丰富的注记内容，融合刊本的信息，甚至据刊本改动底本用字。通过梳理刊本东传背景下的《文选》手抄本传承，有助于充分认识日本现存古钞本的历史形成背景与文本面貌来源，深入揭示书籍载体从手抄本向刊本的演进历程与文化动因。

**关键词** 手抄本传统；刊本东传；传承困境；《文选》九条本；传承效果

清朝末年的杨守敬在出使日本期间注意到此地藏有一批由日本人自奈良平安（710—1192）至镰仓室町时期（1192—1573）不断转抄而成的汉籍手抄本。他从物质载体的角度分析手抄本得以留存的观点<sup>[1]</sup>，成为当下学界的基本认识。然而，诸多写卷逾邈千祀、得存一二，自有其历史背景与文化传统。尤其令人备感惊讶的是，在中国逐步向日本输入刊本的历史时期，古老的手抄本未曾被抛弃，转抄古本的学习传统仍然获得延续。考察日本手抄本如何在中国刊本东传的背景下展开传承，不但有助于揭示日本现存古钞本的历史形成背景与文本面貌来源，还将呈现书籍载体从手抄本向刊本的演进历程与文化动因。作为一个历经日本贵族藤原式家多代名人传抄学习的手抄本，《文选》九条本展现出的复杂文本面貌，对于考察上述话题颇有帮助。本文将以此为中心，抉微钩沉，展开探讨。

## 一 基于手抄本的古典传统

隋唐时期，日本不断派出使臣、留学生和留学僧来到中国学习繁荣的文化。中国书籍也在这个时期经由使臣等人的购买和携带输入日本。唐开元

初，栗田朝臣真人“悉赏物贸书以归”<sup>[2]</sup>。同样入唐的玄昉返回日本时则带回经论五千余卷。而手抄本是此时书籍传播、学问传授的主要手段。大量的中国书籍以写卷的形式传入日本，并在日本得到保存、复制和学习。《日本书纪》记载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子相善而“俱手把黄卷”<sup>[3]</sup>，向曾负笈中原的南渊清安学习周孔之教。“黄卷”指的便是手抄本。而正仓院古文书对奈良时期抄写佛经汉籍之细节的记录，各类绘卷对平安时期贵族手持写卷阅读场景的展示，均是对日本手抄本形式的生动再现。日本人正是以手抄本为载体，对中国文化展开学习。手抄本逐渐成为日本历史上输入中国文化、承载学问尊严、维护王权道统的重要媒介。

首先，手抄本代表了渊源自中国隋唐时期的知识与文化。中国书籍传入日本伊始，向贵族及朝廷官吏进行传播的一个渠道乃是大学寮这个官方教育机构。大学寮肩负着为日本培养高级汉文人才的重任，课程讲授以汉唐注疏为主。在经学方面，《毛诗》用郑玄注，《尚书》用孔安国传，《老子》用王弼注，《左传》用杜预注，《论语》用皇侃注疏。而在诗文写作领域，作为文章范本的《文选》，授课底本使用了萧统编纂的白文三十卷本，注音用曹

宪、萧该注，释义用李善注。这些内容是为汉唐学问之代表，无论在当时的中国抑或日本，都是以手抄本的方式进行传播和学习。被日本人视为“学问之神”的菅原道真曾说“学问之道，抄出为宗”<sup>[4]</sup>。“宗”字点明在日本人的认识当中，纸本手抄方式是获取学问的重要途径。手抄本不仅仅是一种文本书写载体，也成为渊源自中国隋唐时期之知识与文化的象征。

其次，手抄本承载了平安时期以来各博士官的家族学问与尊严。大学寮不同科目分别由特定几家博士官进行传授。例如明经道有清原家、中原家，纪传道有菅原家、大江家，等等<sup>[5]</sup>。而中国学问正是通过父传子、子传孙、祖传孙不断转抄古本的方式，在博士官家族内部代代传承。在大东急纪念文库所藏菅家传本《和汉朗咏集》上有这样一句话：“本云：以‘菅氏十二代之余裔’‘帝王四代之御侍读’大藏卿为长自点之本写之，向后勿添削云々。菅在判。”便将其家族传承的手抄本追溯至十二代以前。而像此类表示家传渊源的说法，在其他博士官家族也是屡见不鲜。中原家是“累祖之秘说”，清原家便是“累家相传之秘本”。

而博士官苦心孤诣代代传承手抄本，乃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捍卫其在社会中赓续学统的身份。安元三年（1177）四月二十八日夜，京都樋口富小路发生火灾，很多朝廷机构包括大学寮一夜之间化为灰烬<sup>[6]</sup>。自此之后大学寮一蹶不振，博士官失去工作的场所而名存实亡。在这种情况下，手抄本更是承载着重振家族、光耀门楣的光荣梦想。大江匡衡能够转变为摄政藤原氏的家臣，清原教隆得以在镰仓政权中占据一席之地，都离不开那承载着累家秘说之手抄本的加持。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博士官都能够重拾荣耀。在清家、中家、菅家、江家、南家、式家、善家总共七门博士官家族当中，“有不坠先绪而教授者，又有怠学反术废其家传者，又有其家无嗣而才名存者”<sup>[7]</sup>，那是一幅博士官家族在时代中兴衰沉浮的群像。

此外，手抄本还代表了权贵阶层所独占的文化资源，并衍化为指向国都京城之王权象征。中国的知识与文化自传入日本后，主要是在贵族及中下层官吏当中流行。权贵阶层为了能够独占这些知识

与文化，保持自身的优势地位，鲜少对外公开手抄本。“家本”“秘本”“秘说”等表述频频现于手抄本之卷末，已然表明了知识传授的秘密倾向；至于专门强调“子子孙孙传得之者，深藏匮中，勿出阃外”“依秘本无外人也”等识语，更是揭示了一种占有资源的排他性心态。而自延历十三年（794）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以来，京都成为呈现并繁衍中国文化的重要场所。博士官在京都的大学寮任职，家传秘说在京都的宅邸代代传习，手抄本在京都的豪门显贵当中传阅。京都是王畿之地，这一切活动在此地自然而然地展开。经历的时间越久，行为、文化与空间的勾连便越发密切。手抄本由此也同京都所代表的王权道统建立起一种看不见但非常紧密的联系。正如《白氏文集》于日本皇室而言，便是“一部象征独占文化资源、保持政权尊严的重要典籍”，因此“保有或有资格传抄旧抄系统《白氏文集》，就象征着其本人拥有天皇血统之中最有尊严的一系”<sup>[8]</sup>。

因此，当平安末期政治格局突变，关东地区崛起，一个同京都形成对抗的政权诞生之际，代表家族尊严、皇族血统的手抄本是否只能在京都流行，在关东传授的正统性何在，此类问题油然而生。手抄本所面临的冲击不止于此，此时已经迈入雕版印刷时代的中国，开始向日本传来了刊本。

## 二 刊本传来的手抄本传承困境

公元960年，中国宋朝建立。但在此前的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已经开始使用雕版印刷术刊刻书籍，后蜀毋昭裔刊刻的《五臣注文选》可为代表。自宋以降，雕版印刷术逐渐成熟，四川、福建、浙江等多个刊刻中心先后涌现出来，刊本变得大为流行。此时的日本正处于平安末期，相当于村上天皇时期，也是位极人臣的摄政藤原道长所正在经历的权势鼎盛时期。因此，藤原道长往往能够第一时间接触到中国商人带来的“摺本”，包括《五臣注文选》《白氏文集》等，然后再将之转呈给天皇<sup>[9]</sup>。

所谓“摺本”，指的便是中国此时出现的刊本，一种有别于手抄本的崭新书籍载体。它们主要搭载民间往来的商船，以及通过入宋僧人的携带，东渐

至日本并很快引起权贵们的好奇。藤原道长关注和记录摺本的传来，或许可以理解为一种把握中国崭新动向的政治活动。而作为享有“日本第一大学生”美誉、且位至左大臣的藤原赖长，则有意将“摺本”纳入到手抄本的文化传统之中。其日记中好几次因获得新版本而倍感欣慰的经历，都与《五经正义》刊本有关。例如康治二年（1143）七月借得《礼记正义》七十卷，感到“胜得万户侯”。同年十一月为获得他人手中的《周易正义》，不惜拿出珍藏的书籍作为交换，结果如愿以偿，其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甚于得到千金<sup>[10]</sup>。一旦拿到刊本，他便积极同手中已有的博士官手抄本进行校勘和学习。显然藤原赖长为获得摺本所做的努力，不仅仅是为了充实自己的藏书，更是为了对接手抄本传统，受到内心积极求取学问、复兴汉学之使命感的催促。

无论是《御堂关白记》记录摺本传来的举重若轻，还是《台记》当中收获摺本的感动笔墨，都说明中国刊本正在逐渐侵入日本贵族的精神世界，并对平安时期形成的手抄本传统形成了冲击。而当我们目光转移到关东地区，则能够发现刊本对手抄本的冲击更为明显和剧烈。初代将军源赖朝在镰仓大开幕府（1192），与京都在各个方面形成分庭抗礼之势。而刊本的传入，正好契合了镰仓幕府在文化教育领域的对抗需求。

一方面，不少京都博士官的后裔来到关东参与新政权的建立，并带来曾流行于京都的学问。出身京都宇多的源仲章曾任幕府的大学头文章博士，中原家的中原师员担任过第四代将军九条赖经的侍读。最有名的要数清原家的清原教隆。他加盟幕府，期间曾为第五代将军九条赖嗣讲解《帝范》，为关东地区的豪族北条实时讲授过《古文孝经》《春秋经传集解》等。他的儿子直隆、俊隆，以及清家良枝，其子宗尚，世代活跃于关东地区，将清家累代之学悉数传给了北条氏。

另一方面，前往中国求法的僧侣归国后成为关东地区的座上宾。他们向幕府将军介绍中国刊本，甚至自行翻刻刊本。“圣一国师”圆尔自宋返日之际，带回大量典籍，中有《晦庵大学或问》《晦庵集注孟子》等宋学刊本。此地兴起的足利学校，邀请著名僧侣如快元、九华、寒松等人担任庠主。该

校珍藏至今的《周易注疏》《尚书正义》《礼记正义》等南宋越刊八行本，便是在这个阶段由众人购或寄而来。镰仓寺庙还在中国刻工的协助下率先对《昌黎先生文集》《三体诗》等宋元刊本进行翻刻。翻刻本传于后世，成为著名的“五山版”。

从此时传入日本的中国刊本覆盖宋代书籍的不同领域，尤以宋学新注、唐宋诗文受人瞩目。虎关师炼、雪村友梅、中严圆月、绝海中津等人都是积极吸纳宋学新注，喜读宋诗新体的代表。义堂周信曾说过：“近世儒书有新旧二义，程朱多等新义也。宋朝以来儒学者，皆参吾禅宗，一分发明心地，故注书与章句学迥然别矣。”<sup>[11]</sup>如前所述，博士官自平安时期以来传承之手抄本，主要源于汉唐注疏，重在字词典章训诂。但是，宋人却是“以六经注我”，重在发明义理，因而形成崭新风格。这在其看来，既是受益于禅宗之法门，也便是值得关注之内容。一条兼良《尺素往来》还记载，玄惠在为消灭镰仓幕府的后醍醐天皇侍讲之时，“程朱二公之新释可谓肝心候也”，并建议读《资治通鉴》《宋朝通鉴》《北碕文集》、韩文、柳文，等等<sup>[12]</sup>。

在这样复杂的、受多方利益驱动的历史背景下，刊本对手抄本的冲击便不仅仅是一种新型载体对旧式载体的冲击那么简单。刊本代表的，是禅林僧侣的精神要求，是新兴知识阶层在关东地区的文化趣味，背后还交织着将军幕府与京都政权在文化教育层面隐藏的刀光剑影之斗争。而手抄本则如前所述，象征了自奈良平安时期起便传入日本的中国汉唐之学，也是旧时代知识阶层的家族学问与尊严，更是定鼎京都、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族正统与古典命脉。是完全投向刊本的怀抱，还是坚守手抄本的阵地，任谁一个行为的选择，都将让历史的长河泛起涟漪。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手抄本要如何顶住刊本的压力而求得传承的空间，无疑需要一些变通举措。接下来就以《文选》古钞在日本中世的传承为例，展开文本方面的分析。

### 三 《文选》九条本的传习及文本面貌

原为东山御文库旧物，现藏于日本宫内厅书陵

部有一份曾为九条公爵家所有的《文选》古钞本（简称为“九条本”）。这个本子的特征是仅有《文选》白文，存二十二卷，其中第十四卷重复，故实际内容共有二十一卷。九条本是目前日本所发现的关于《文选》古钞存卷最多的一个本子，距离萧《选》三十卷本仅差九卷，能够反映出早已亡佚的三十卷白文本面貌，有助于纠订《文选》在注释、传抄以及刊刻过程中产生的讹误，因此文献价值极高，也深受学界的重视<sup>[13]</sup>。但是，我们往往关注九条本白文层面提供的文献校勘价值，却鲜少留意其复杂的文本面貌，更遑论其背后曲折的形成过程与传承之道。其实，九条本各卷历经多代传抄及加点，文本面貌颇为复杂，叠加了不同时代的文本信息，甚至带有晚出刊本的特征。这对观察手抄本传统在传承困境之下的变化极有帮助。

#### （一）宣称文本底本的来源及其权威性

九条本除了卷八、十六、二十一、二十二这四卷缺乏识语，其余卷末均载有识语。其中披露的抄写者如藤原宗光、藤原长英、藤原师英，均出自日本历史上极为显赫的藤原家族之分支——藤原式家。识语显示该本从抄写、制作到加点、传授经历多个步骤，且各卷的完成时间进度不一，中间跨越两个世纪，清晰呈现出九条本历经藤原式家多代人传承的特点。

首先，这些识语当中有不少来自底本上的奥书识语，清晰地揭示出底本的构成。古代日本人在转抄古本之际，会将底本的内容包括卷首卷末附加的信息原封不动地复制一遍。识语跋文的前面加上“本云”“奥书云”“奥云”“本奥云”等标记，作为源自古本的证明。例如：

保元二年（1157）二月廿三日，见合证本了。借请菅冠者之本加一见了。公重。（卷十七）

本奥云：养和二年（1182）五月廿六日，于洞院亭书写了。七月朔日墨点了。散位菅以业。（卷十五）

建久三年（1192）十一月十四日，以家说授筑州别驾了。散位菅一。（卷十五）

弘安三年（1280）无射十八日，以家秘说奉授秋田城务好土既讫。前吏部少卿诸范〔花

押〕。（卷二三）

本云：弘安八年（1285）六月廿五日，以菅、江两家证本校合写了。散位藤原相房。（卷一）<sup>[14]</sup>

这是九条本各卷当中提到时间较早的六条识语，清晰展现出底本自有古老而权威的渊源——以菅家证本为主，并结合其他博士官家本。卷十七说“借请菅冠者之本”。卷二十说“以菅给料家本写点了”，记录的是藤原宗光向菅家借阅家传古本，并据以校勘和移点的情况。卷十五直接以“本奥云”转引了菅家古本卷末的奥书，卷二三亦是同样的情况。卷一直接说明该卷乃是同时参校菅、江二家的证本。尽管识语透露出九条本的各卷构成并不统一，颇为复杂，却都大有来头，富有值得世代传承的意义。谨以提供古本的菅家为例进行说明。

菅原家族自平安初期开始，便形成了讲授和传习《文选》的传统。该家族世居京都，连续多代担任天皇侍讲，极为恪守家学。菅原道真在《菅家文章》中屡次提及的“严君”，便是一个向后人严格传授《文选》等学问的父亲形象。还有出自菅家一脉的古本——现为冷泉家时雨亭文库所藏的《文选》卷二，识语中“当家秘说”“严亲之御说”的表述，也足以说明菅家内部传承《文选》的严格态度与要求。毕竟这些家传秘说，是菅家骄傲的真正来源，代表了一种掌握学问知识的能力，更是赢得天皇及豪族显贵青睐的资本。菅家不但多次为天皇讲授《文选》，而且多有依附于摄政、关白大臣豪族的举动，并向他们出借家传证本。这便是九条本能够以菅家本为底本之前提条件。

但是，为何九条本的制作，要以博士官家传证本为底本，而不选择以刊本为底本呢？事实上，在九条本的诞生环境中已经出现中国的刊本。九条本的传抄活动始自平安末期康和元年（1099），远远晚于前述藤原道长《御堂关白记》关于“五臣注文选”“摺本注文选”的记载，分别时在宽弘三年（1006）与宽弘七年（1010）<sup>[15]</sup>。而前述“圣一国师”圆尔于仁治二年（1241）带回中国典籍数千卷，其中便有《六臣注文选》。九条本最晚一卷抄写于南北朝时期康永二年（1343），正好覆盖了《文选》刊本传入的这一时间节点。而且九条家凭

借其优势地位和条件，往往能够很快就接触到这些材料。正是因为获得与使用刊本的条件如此便利，才更加反衬出九条本之底本选择的深长意味。这正点明了本文第一部分阐明的内容——传承手抄本，便是在继承古典文化传统。

只要九条本的底本来自博士官的家学，便无损其作为继承自平安时期学问的手抄本之权威性。且看九条家后人是如何传抄的。在卷一之末：

正应五年（1292）五月九日点了《文选》。十二三岁之时，两年以自笔令书写，受严君之说了。而先年甘绳回禄之时，皆以为灰烬了。仍为授幼稚所令校点了。散位藤长英。

正庆二年（1333）二月十四日书写了。散位藤原师英。

翌朝写朱墨两点勘物了。师英。

藤原长英的识语提到他十二三岁的时候从“严君”即父亲那接受《文选》的学问，耗时两年亲自制作了一份手抄本，后来以为在大火中化为灰烬。为了将《文选》传给下一代，他又重新校勘并加点。最后两条识语的落款者是藤原师英。藤原师英是藤原长英之子，正是从藤原长英那继承了《文选》之学。这种认真传授家传古本的态度，与博士官严守“家学”的要求保持高度一致。

手抄本从诞生的那一刻起，便从原来的权威底本那里分享了一种同样值得被认真对待和严格传承的特质。这也是手抄本能够被继承和保留的根基，是手抄本传承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如若底本来源不正，则根基不稳，也便失去约束力。而这一点也成为时人的共识。虎关师炼列举求学必读之书，包括《毛诗》《尚书》《群书治要》《文选》《文集》等四十余本，“其书传虽多，以家本为正也”<sup>[16]</sup>。

## （二）注记：刊本进入手抄本的途径

九条本除了卷二十二，各卷均有校语、训点及引自《集》《钞》《音决》、陆善经注、李善注、五臣注等注释。本文将这些内容统称为“注记”。注记的出现方式有两种，一是随文出注，附在白文之旁，该情形下的内容较短，最多七八字，一般两三字。另一种方式则在眉栏、栏下或纸背补充大段的注文。九条本的大段注记颇多，且存在重复抄录的现象。这些注释实际上存在多个来源，其中一个出

自仅由日本得以保留下来的《文选》注本《文选集注》，笔者对此另有专文讨论<sup>[17]</sup>，另一个来源便是《文选》刊本。

九条本利用过中国的《文选》刊本存在明确的证据。代表着“摺本”的“扌”字符频繁出现在了九条本当中，如《三都赋序》“考之菓木”旁记：“果，扌”。表示“菓”在刊本中作“果”字。类似例子众多，兹不赘述。而通过比对九条本抄录的大段注文，可以进一步发现参考之本的特征。《南都赋》中“侍者盍媚”句，九条本眉栏作“善曰：《左氏传》子产曰：在《周易》女惑男谓之盍。盍，媚也”。注文内容完整。然而实际上，根据李善注释的省略体例，应作“盍，已见《西京赋》”。由此说明，此条注文并非来自单李善注本。注记当中频繁出现的“善某字”“五某字”校语，似在暗示九条本利用的是一个可以同时参考到李善注和五臣注的合注本。下面再以《蜀都赋》注记为例展开分析，该卷恰好幸存《文选集注》卷八作为参照。

例一：“觞以清醪，鲜以紫鳞。羽爵执竞，丝竹乃发。巴姬弹弦，汉女击节”旁注：

清醪，清酒也。醪，匹眇。鲜，新杀也。

刘曰：鱼鲙也。紫鳞，鱼也。羽爵，羽觞，作鸟形也。巴姬，翰曰：蜀之美女也。汉女，汉之美人也。

九条本抄录的刘逵旧注，仅采纳了“鱼鲙也”这一意见，而且异于《文选集注》“鱼中鲙”的表述，反合于北宋本、尤袤本、明州本、赣州本等刊本。余下内容均采用了五臣李周翰的说法，如“鲜新杀也”“紫鳞鱼也”“羽爵羽觞作鸟形也”这三处。由此可见，九条本所据之本，应当是一个既可以看到刘逵旧注，又可以直接抄录五臣注的本子。

该例关于“巴姬”“汉女”的解释进一步暗示九条本的参考对象。《文选集注》刘逵注将“巴姬汉女”合解为“巴汉之美人”。比对可知，北宋本、尤袤本解“巴姬”为“汉之美人”，陈八郎本、明州本等则解为“巴姬、汉女，蜀之美女也”，均有所遗漏或讹误。但九条本所录注解则是完整清晰的，明确区分出“巴姬”“汉女”分属巴郡、汉中二地之美女的含义，可见其参录之本，较今人目前所见各类版本更为准确。

例二：“幽思绚道德，摘藻挾天庭”的栏下及纸背，抄录了两条几乎一模一样的注释：

（栏下）刘曰：班固述《雄》传曰：初拟相如，献赋黄门，故曰“摘藻挾天庭”也。《汉书·礼乐志》曰：长丽前挾光耀明。

（纸背）又云：班固述《雄》传曰：初拟相如，献赋黄门，故曰“摘藻挾天庭”也。

这两条注记出自刘逵旧注，区别有三：一是“刘曰”在纸背作“又云”；二是“班固”之“班”字写法不同，栏下作“班固”；三是栏下多引了《汉书·礼乐志》来补充“挾”字用法。九条本在两个位置重复抄录了两条相似度极高的注释，颇显累赘，因而很有可能这两条注是分批次，录自不同的出处或文本。一方面，通过观察“班固”作“班固”的特殊写法，可知栏下所录注文与《文选集注》内容一致。二者呈现出相同的书写习惯：“班”写作“斑”。该句中“斑”字写法也呈现出相同的书写习惯。这是手抄本尤其是《文选集注》一个常见的写法，如该书卷一一三《夏侯常侍谏》“从班列也”句亦写作“斑”字。

而这条纸背注记通过“又云”发端语，我们反而在刊本当中找到了对应的线索：北宋本、尤袤本、明州本、赣州本等刊本在“班固”前均有“又云”二字。九条本纸背注文合于该刊本特征。

发端语之差异，正暗示了文本来源之有别。不妨回归到这条注记所在纸背之整体环境：

向曰：相如为文繁富，故云郁。君平怀道清静，故云矚若。韡晔，王褒词论生光彩，若草木秀盛而发也。杨雄含怀文章，挺拔而生。

刘曰：君平作《老子指归》，子云作《太玄》《法言》，故曰幽思绚道德也。汉武帝读相如《子虚赋》，诵而善之，吾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元帝善王褒所作《甘泉》《洞箫颂》，令后官贵人皆诵之。扬雄奏《羽猎赋》，天子异焉。又云，班固述《雄》传曰：初拟相如，献赋黄门，故曰摘藻挾天庭也。

在这条“又云”前面，乃是“刘曰”。“刘曰”之上是“向曰”，由此再次证明九条本所参之本是一个合注本。如果抄录顺序依据的是原书顺序，则这可能是一个五臣注在前、李善注在后的合注本。

例三：“公孙跃马而称帝，刘宗下辇而自王”眉栏：

善曰：范晔《后汉书》曰：公孙述，字子阳，扶风人也。王莽时为导江卒正。更始立，述恃其地险众附，遂自立为天子。《蜀志》曰：先主姓刘，讳备，汉靖王胜后也。益州牧刘璋使人迎先主，令讨张鲁，先主遂进围成都。璋出降，先主即皇帝位。备“汉后”故曰宗。这条注文虽长，但只要比对一下《文选集注》和刊本，就会发现九条本抄录的注记来源：

《文选集注》李善曰：范晔《后汉书》曰：公孙述，字子阳，扶风人也。王莽时为导江卒正。更始立，述恃其地险众附，遂自立为天子。《史记》蔡泽曰：吾跃马食肉，富贵卅三年，足矣。《蜀志》曰：先主姓刘，讳备，字玄德，涿郡人。汉靖王胜后也。灵帝末，先主领徐州，后益州牧刘璋使人迎先主，令讨张鲁。先主遂进围成都。璋出降，先主即皇帝位。汉后故曰宗。《西京赋》曰：恣意所幸，下辇成燕。

异文之处已用下划线标出。《文选集注》的善注内容远远多于九条本抄录的善注，如“《史记》蔡泽曰”云云、“字玄德涿郡人”“灵帝末，先主领徐州后”“《西京赋》曰”云云四处。而九条本这五处异文完全合于北宋本、尤袤本、赣州本等刊本。渡边さゆり曾分析过西园寺本和九条本对刊本之利用，并推测可能与留存至今的足利学校所藏宋刊明州本存在一定的关系<sup>[18]</sup>。然而在此例当中，“王莽”至“遂自立为天子”句并不见于该明州本，则该结论不适用于九条本的全貌。由此可见，九条本各卷学习情况参差不齐，可能参用过不止一种《文选》刊本。想要落实九条本注记的刊本出处，还需要更加全面系统的核对。而且，这些注记究竟是藤原式家所为，还是其底本即是如此？我们认为两种情况皆有可能。九条家底本之一菅家传本，现存有冷泉家本卷二，同样具有刊本混入注记的情况，且多次明确提到“六臣”的字眼，有些还与九条本存在重复之处，可证相近来源。至于九条本那些不见于冷泉家本的注记，当是藤原式家根据刊本录入或另有来源。

总之，刊本进入手抄本的途径之一便是作为注记，出现于手抄本的天头地脚，与传承已久的底本内容和諧地共生共存。刊本为九条本提供了丰富的注释信息。那些能够被选中化为注记的信息，证实存在着无数个阅读、学习和选择的过程，也说明刊本在手抄本的传承中获得一定的重视。

### （三）以刊本校改手抄本的现象

日本士人在传习《文选》过程中利用了刊本来帮助阅读和理解原文，这些注记作为注释内容尚未动摇原来古本的面貌。那么对于原文的内容，传抄之人是否会带入刊本特征，乃至于改动底本用字？这也是对手抄本传承效果的叩问。

判断九条本正文中的用字是否出自刊本，并非由某字合于刊本便可获得认定，而是需要抓住那些属于刊本系统的用字特征。即，如果认定某个用字来自刊本系统，那么该用字应当是在目前的文献条件下，经由不同系统版本校勘之后，能够确认仅仅出现于刊本当中的用字。换言之，排除该字的早期来源是关键的一步。只有那些目前暂时没有发现更多早期来源而独属于刊本系统的异文，才能被视为刊本用字。这便需要更多的写、钞本文献协助判定，包括中国出土的敦煌、吐鲁番写卷和日本流传的古钞本。

根据参校版本最多的《西京赋》之校勘结果来看，基本不存在上野本、正安本、弘安本的用字单独合于刊本的情况。相反，仅有九条本与刊本共有一批异文，数量多达15例。这批异文的特点表现为：在上野本、弘安本、正安本与法藏敦煌本P.2528保持一致的情况下，只有九条本的用字合于尤袤本、陈八郎本、明州本、奎章阁本等刊本。譬如赋中有以下两句：“狭百堵之侧陋”与“冲狭燕濯”。此处“狭”字，各个写、钞本同作“陋”，唯有九条本均合于刊本作“狭”。类似例子还有各个写、钞本作“鞅”，而九条本同刊本作“鞞”；写、钞本作“耽”，而九条本同刊本作“耽”；写、钞本作“偃促”，而九条本同刊本作“齷齪”；等等。除了异体字之别，九条本还有一些字形字义存在差异的例子。比如“丽美奢乎许史”句，“美”写、钞本均作“靡”，唯有九条本同刊本作“美”；又如“跳丸剑之挥霍”句，“挥”写、钞本

作“徽”，九条本同刊本作“挥”。

九条本这个特征不仅仅由《西京赋》得以呈现，即便考察其他篇目也能得到印证。譬如《吴都赋》“皆与谣俗汁协”句，“汁协”俄藏敦煌本L.1502和大东急本同，九条本同陈八郎本、朝鲜正德四年本、奎章阁本作“叶协”。《励志诗》“勉尔含弘”句，“尔”俄藏敦煌本Φ242和杨守敬本同，九条本同陈八郎本、奎章阁本作“志”，等等。

然而，尽管在与其他版本的对校中，出现了仅有九条本合于刊本的用字特点，但这是否便意味着是日本人根据刊本改动了九条本的底本用字？实际上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刊本参考了九条本的底本。我们认为早期写本的特征或多或少会得到晚出刊本的继承和反映，后一可能性毋庸置疑。九条本的底本出自中国早期三十卷本系统的白文本，自是中国传世刊本的渊源之一。因此无论是五臣注刊本还是李善注刊本，均可分别从九条本当中找到相同的特征，九条本自然存在合于刊本系统的特点。

因此，那些排除了早期来源且合于刊本的用字是否出自日本人的改动？这便需要将九条本与相同传承背景的日本古钞进行比对，以进一步确认文本面貌。杨守敬在日本发现的二十卷古钞本与九条本的卷数相近，可供比对的内容最为全面。通过全面校勘可以发现，九条本既有不少合于杨守敬本、尤袤本的用字，但也存在一些异于杨守敬本、《文选集注》、尤袤本，却合于陈八郎本、明州本等五臣注刊本的例子。九条本和杨守敬本虽然均为日本手抄本，来自共同的文化背景，但是这些超出杨守敬本的异文，说明九条本已经带有日本人根据刊本进行学习的痕迹，是一个被校改过的距原貌较远的本子<sup>[19]</sup>。而斯波六郎曾运用九条本与日本传抄的五臣注三条本互校，也得出了九条本在好几次抄写过程中受到当时新传来版本之影响的结论<sup>[20]</sup>。现在我们通过校勘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确认九条本在传抄过程中会根据刊本修改底本面貌。

日本贵族在学习过程中不但会据刊本抄录注记，甚至可能据刊本修改手抄本底本的用字，这一行为无疑超越了博士官坚守家学的传统，也冲击了我们对手抄本及其所代表之文化的固有认知，对手抄本在日本中世的传承之效果、意图产生新的认识。

#### 四 手抄本传承效果分析

日本贵族和博士官尽管能够见到并利用刊本，但不意味着一定会选择依据刊本改动古本的面貌，尤其对于保守的博士官而言，改动家传古本可能不是一个那么明智的举动。但是，由于九条本自身的复杂底本来源，以及传抄者超然于博士官家族之外的地位，决定了它恰好代表了态度开放的那一边。

九条本不是以单一古本为底本抄写而成，而是转抄自不同家传本。山崎诚通过日语训点的分析，明确指出上帙十卷出自菅、江两家证本的校合本（藤原相方、源信元是否出自式家尚不清楚），卷十五、卷十七、卷二十出自菅家本（卷十二至卷十六也很有可能），卷二十三（卷二十一、二十二无训）出自南家本，卷十四出自别本（院政期的写本）<sup>[21]</sup>。各卷底本来源不同，情况颇为复杂，显示出一种融合诸本的性质。而九条本传抄者的身份地位又不同于博士官，来自藤原式家，乃是古代日本豪族藤原氏之一支，现今收藏者九条家乃是记载了“摺本文选”传入日本的藤原道长一脉，在日本历史上一直以外戚身份垄断了朝廷摄政关白的权臣之位。藤原家族地位显赫，能够同时与各博士官如菅家、江家交好，借得各家所传秘本，也能够最先接触并使用从中国传来的刊本。但是他们不像菅家、江家这些博士官背负着传承家学的使命，家学包袱不会那么沉重。大概因此，他们在对待“古本”“证本”以及刊本的态度上也便颇为开放，甚至敢行“出格”之事，根据刊本径直改字。这使得九条本呈现出融合多家证本，又参校刊本的独特风格。

而九条本透露出的京都贵族在传承手抄本过程中对刊本之重视，背后也有着维持手抄本传统及地位的考虑。如前所述，刊本在关东地区备受重视。此地很多经由清原家传承一脉的手抄本，已在积极使用刊本进行校勘和补充音注、释文信息。“比较摺本”“以摺本附反音了”“以摺本附释文了”等识语便是明证。面对刊本和手抄本互异的情况，也会以“イ”“才”的形式标出别本异文。武内义雄、山崎诚、和岛芳男等日本学者的研究均证实，根据

传来刊本对古老的学问知识进行订正是一种普遍的做法<sup>[22]</sup>。关东地区依据新的文化资源作为对抗京都政权的武器，而京都贵族自然也采取相应的举措，在维护手抄本权威性的同时不忘融入刊本的特征。这正是《文选》九条本展现的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注重手抄本的底本来源，选择博士官的家传证本，确保内容来源的权威性和神圣性。二是在底本的基础上，参校刊本的用字，移录补充刊本中的崭新注释。这样一来，既能够保留自古以来传承的内容，又能吸纳崭新事物。这样的做法暗合日本民族一贯的守住底线而又博采众长的风格。

梳理并确认九条本的传承举措与文本面貌，无疑更新了我们对于日本现存古钞本的固有观念。这说明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很多古钞本，可能同时存在着与古老写本、晚出刊本的复杂勾连。在上述讨论中，九条本尚有一些卷数由于缺乏早期文献作为参照，暂时无法展开深入的讨论，又同哪些刊本发生过何种联系，也需要在后续研究进行充分探索。尽管如此，我们从整体上得出的这个结论，仍然能够加深我们对日本所发现的古钞本自身特点的认识。

#### 结 语

本文以《文选》九条本为中心，充分探讨中国刊本传入后与日本手抄本传统所形成的文化冲突与融合，以及由此对文本的传承面貌产生的影响。

手抄本是日本输入中国文化、承载学问尊严、维护王权道统的重要媒介。《文选》九条本正是由日本历史上著名的藤原式家世代相传。其底本出自博士官之家传证本，保证了源于中国隋唐时期的权威性。然而随着中国刊本的传入，关东地区的崛起，平安时期形成的手抄本传统受到了冲击。为了继续维持手抄本的象征意义，京都贵族需要在传承手抄本的过程中采取一些举措，因此九条本在传习过程中也开始利用刊本，抄录刊本注文乃至据刊本改字。这便使得手抄本的文本面貌也随之发生变化，九条本由此成为一个呈现从手抄本向刊本转变的过渡性文本，具有独特的文本面貌。

而考察日本的《文选》手抄本传承，也揭示出

书籍载体从手抄本到刊本可能经历的曲折历程。在日本，手抄本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刊本传入的大背景下，继续获得使用和传承，离不开文化传统的加持与传承手段的帮助。但是在中国，书籍形制的更替主要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造纸技术促使书写材料从金石竹帛转向纸张，雕版印刷术则促成了大批量刊本的产生。在中国因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促进知识载体革新的演进历程中，读书人或基于阅读习惯，或基于市场导向，来宣判手抄本的命运，但鲜少直接上升到政治层面。从这一点来看，日本的手抄本传承之复杂性，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东亚历史上书籍与文本传承过程的认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日藏《文选》古钞本整理与研究”(21CZW01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具体原因有三：一是家有土藏；二是用纸坚韧；三是得藏古刹。参杨守敬《日本访书志·缘起》，《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志书目集成》第9册，贾贵荣辑，第11—13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

[2]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第20册，第6209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3] 舍人亲王：《日本书纪》，《国史大系》第1卷，第418页，经济杂志社1897年版。

[4] 菅原道真：《书斋记》，《本朝文粹》，《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27，第333页，岩波书店1991年版。

[5] 桃裕行：《上代学制的研究》，吉川弘文馆1983年版。本文所涉日文文献均译成中文。

[6] 鸭长明：《方丈记》，《新订校注日本文学大系》第2卷，第412页，风间书房1955年版。

[7] 太极：《碧山日录》，《史籍集览》第25册，第151页，近藤出版部1907年版。

[8] 静永健：《日本旧钞本〈白氏文集〉校勘方法》，陈翀译，《中文学术前沿》2010年第1辑，后收入《汉籍东渐及日藏古文献论考稿》，改题为《论日本旧抄本〈白氏文集〉校定方法》，第151页，中华书局2011年版。

[9] [15] 藤原道长：《御堂关白记》，《日本古典全集》第1回，第124页，第227页，日本古典全集刊行会1926年版。

[10] 藤原赖长：《台记》第1册，第87—110页，临川书店1966年版。

[11] 义堂周信：《空华日用工夫略集》，第147页，大洋社1936年版。

[12] 一条兼良：《尺素往来》，《群书类从》第9辑，第510页，续群书类从完成会1960年版。

[13] 日本学界对九条本的研究用力颇多，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如阿部隆一《关于东山御文库尊藏（九条家旧藏）旧钞本〈文选〉》、斯波六郎《九条本文选解说》、中村宗彦《九条本〈文选〉古训集》、池渊质实《九条本〈文选〉研究序说》及系列校勘记、山崎诚《式家〈文选学〉一斑——〈文选集注〉的利用》，等等。因条件所限，中国学者仅有傅刚先生加以研究，可参《日本宫内厅藏九条本〈文选〉研究》一文。本文使用的九条本影印件由傅刚先生所赠，特此致谢。

[14] 引文录自九条本，标点为笔者所加。为与行文保持一致，下文引自九条本等古钞本的内容，除个别文字为区分异文而保留繁体外，其余均改为简体。

[16] 虎关师炼：《异制庭训往来》，《群书类从》第9辑，第482—483页。

[17] 参高薇《日藏〈文选〉白文古钞引〈文选集注〉考论》，《文学遗产》2022年第3期。

[18] 渡边さゆり：《日本〈文选〉的学习——基于训点资料的考察》，《比较文化论丛：札幌大学文化学部纪要》2008年第11期。

[19] 详细举例与说明请参高薇《日藏白文无注古钞〈文选〉二十卷本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2018年第19辑。

[20] 斯波六郎：《九条本文选解说》，李庆译，《文选索引·附录》，第5—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21] 山崎诚：《中世学问史的基底与展开》，第421—422页，和泉书院1993年版。

[22] 武内义雄：《武内义雄全集》第2卷，角川书店1978年版。山崎诚：《中世学问史的基底与展开》，和泉书院1993年版。和岛芳男：《关于中世宋学的受容》，《帝国学士院纪事》1947年第5卷，第2、3号。关东地区存在以刊本作为抄写底本的个案，如清原家便以中国刊本为底本，重新制作新的授课教材。但是这些个案的出现均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如为了补足原本），并非普遍现象。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责任编辑：李超